

目 录

汉口第一家外国银行——英商麦加利银行	
.....	蔡萼英 (1)
武汉最早的外商工厂——俄商砖茶厂	
.....	郭其耀 (12)
汉口汇丰银行概述	
.....	余舜丞 王家滋 (16)
汉口美孚洋行记略	
.....	周季东 黄子权 (23)
英商亚细亚煤油公司	
.....	刘文林 (36)
德商礼和洋行在中国发家史略	
.....	袁汉丞 冯彩丞 (44)
日商汉口诚记洋行始末	
.....	郑梦川 (50)
法商汉口立兴洋行经营内幕	
.....	陆星垣 (55)
汉口颐中运销烟草公司	
.....	丁树亮 (74)
汉口英商太古轮船公司	
.....	杨德周 (83)

对怡和洋行的点滴回忆

.....经济同 (96)

在武汉靛青颜料市场上的外商

.....章伯衡 (103)

武汉钱庄业概况

.....俞雨庭 (107)

民初时的汉口票证经营和交易所

.....何瑞保 (115)

湖北官钱局发行官钱票概略

.....市工商联、民建文史组 (119)

我所经营的华洋贸易公司

.....唐兰樵 (135)

解放前的汉口生丝出口贸易

.....朱和庭 胡筱轩 (141)

略谈江汉关

.....余心香 金来刚 (149)

李国伟和他所经营的企业

.....樊培卿 (155)

大买办刘子敬的兴衰

.....董明藏 (181)

汉口第一家外国银行

——英商麦加利银行

蔡 萼 英

1921年我由舅父唐远坚（唐朗山长子）介绍，进汉口麦加利银行写字间工作，至1949年2月武汉解放前夕，该行奉上海总行命歇业为止，历时二十四年。兹将我在该行的亲身经历和所知所闻，概述于下：

汉口支行的创设

英商麦加利银行（英文名字为Chartered Bank of India, Australia and china），始为商办，1853年加入该国官股，改组为官商合办企业。资本原为二百四十万英磅，又公积金一百六十万英磅；后来增资，一直到1938年以前，它的资本和准备金乃各为三百万英磅。1945年秋，由于战后英磅贬值，据说资本又增·百万英磅，但未见到通告。总行设在伦敦，最高机构为董事会，以下有总经理一人、经理一人、副经理二人。分支机构遍设世界各大商埠。1857年，在我国上海设立分行（后来改称在华总行），接着又先后在天津、青岛、哈尔滨、大连、汉口、广州、厦门等地设立分、支行。在我国抗日战争时期，又在重庆设有支行，于1945年抗战胜利后撤销。

在设立上海分行的同时，在北京也设立了分行。其目的并不是

为了商业性的营业，而是为了配合英国驻华使馆，进行政治财经活动。所有英国驻我国各地领事馆经费，都是麦加利北京分行汇拨；清末和北洋政府时期，历次所借的外债，北京分行不是参加贷款，便是承办收交业务。该分行还经常搜集我国有关政治经济的情报，转告上海分行和伦敦总行。1928年南京政权建立后，北京的麦加利分行即改为支行，其“特殊任务”移归上海分行办理。抗日战争胜利，北京支行感到业务不多，故未复业，直至解放以后，就将房屋转让与印度驻华大使馆了。

1941年冬，太平洋战争爆发，该行在远东地区的分支机构，被日寇没收。1945年秋，日寇投降后，在我国方面恢复营业的，仅有上海、天津、青岛、汉口、广州数处。1949年春，全国解放在望，麦加利见风使舵，先后电令天津分行及青岛、汉口、广州等支行停止营业，遣散职工，上海总行亦缩小范围，准备结束。

武汉为九省通衢，茶叶贸易，异常发达。汉口自辟为通商口岸后，帝国主义者纷纷来汉经营茶叶出口。1863年，帝俄的新泰、顺丰、阜昌、百昌等洋行，先后在汉口开业和设立砖茶厂。据说：这几家洋行的营业额，每年都在纹银三千万两以上。继俄商来汉经营茶叶出口的，有英商怡和、天祥、太平、宝源等。由于当时汉口还没有外国银行，该洋行等如由其本国汇款来汉，均须先通过在上海的外国银行办理结汇，然后由上海大清户部银行转汇汉口。这种汇款调拨，在收款人方面，不仅须多付一笔汇费及电报费，有时遇到汉口市面银根吃紧，还要受到汇率的损失，因此它们都要求外国银行在汉口设立分支机构。上海麦加利银行抓住这一机会，即于1863年夏，派一英籍行员，率领华籍员工数人，来到汉口，赁屋临时营业。这家首次来汉的外国银行，起先还是针对着茶叶生产的季节，循照茶商春来秋去的习惯，作为出庄的性质。到1865年，各国洋行、工厂增多，进出口贸易日渐发达，麦加利为了攫取更多的利润，就在汉口划定的英租界内，购

买地皮，建立行址（今洞庭街五十五号），正式开业了。继之而来的有：英商汇丰、美商花旗、法商东方汇理、俄商道胜、德商德华、日商正金等外国银行。

1911年辛亥革命后，在汉口的外国银行，成立了“汉口外国汇兑银行公会”。由于麦加利是在汉首创的外国银行，即被举为公会永久主席。在汉英国侨商，又借口公余消遣，组织俱乐部，叫做“英国波罗馆”。这个公会和俱乐部，表面是说“联系业务和联络感情”，实际就是交换我国的政治经济情报。麦加利就把这些情报和英商对时局的看法及提议，以秘密函电或长途电话的方式汇报上海分行及伦敦总行。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两者俱被解散，胜利后亦未恢复。

在抗日战争以前，停泊在汉口英租界江边的英帝兵舰，其官兵薪饷中，每月约需三、五万无法币使用，也是由汉口麦加利支行拨付的。拨付后，即由驻汉英领事按汇率折合英镑，签发支票交其逕寄伦敦总行，向英政府兑款。再该行如有秘密急要的电报，亦往往托由驻汉英领事，交兵舰以无线电拍发。

写字间和买办间

麦加利银行汉口支行的内部组织，以写字间为主，一般呼为“洋账房”。人事方面，计有英籍经理一人，会计员一人，会计助手兼司库一人。经理由伦敦总行委任；会计员等则由上海总行派来或从其他地区调来；会计助手均很年轻，须在伦敦总行当几年练习生，升为行员后才派来的，故多呼之为“小洋人”。经理任期一般为二年，至多不超过三年；会计任期一至二年；会计助手有时不到一年也会被调走，据说是为了使他们多学些地区业务知识。西人待遇标准，是根据其在行工作年数，定级定薪，并规定每两年调整一次，经理的任用，须要有在行工作十二年的资格，月薪一百至一百二十英镑，会计员四十五至八十英镑。若按1937

年的一先令二便士半折合法币一元计算，经理月薪高达一千六百五十元至一千九百八十元，会计员等亦有七百四十元至一千三百二十元。

在写字间工作的中国职员人数最多时曾有十人，另有服务生二人，全是通过华经理（买办）介绍来的。中国职员除通晓英语外，还要会英文打字，才能被采用。在写字间工作年久，业务熟悉，有安排一般工作的能力，可升为大写。大写月薪法币二百五十元至三百元，一般职员最低四十五元，最高不超过二百元。再有服务生，只作收发函件及其他琐事，每月工资二十五元至三十五元，经理认为有成绩者，亦有提升为职员的机会。

行里设有一种“养老储蓄基金会”，除西人外，洋账房职员和买办可参加入会，服务生和工人不能加入。其办法是：每月发薪时，由写字间扣除本人工资百分之五，再由行方拿出百分之五，共存入百分之十，专账由上海总行管理。每届年终，由该会发给各人账单一纸，填明本人已存基金数目及利息，但不能动用，到年老退休或因病不能继续工作时，始全数付还，如半途辞职，或犯了过失被开除，则只能取回本人所存之数，余由行方收回。

写字间的中国职员，说是可以享受退休养老的待遇，但须年满六十周岁，在本行工作三十年以上，工作成效经理认为满意，向上海总行签具意见得到批准，方可享受。至于退休费的多少，则无明白的规定，亦凭经理的好恶为转移。

买办间又称“华账房”，后又改称华经理室。它的组织形式是以买办本人为主脑，仅次于西人经理，较一般洋行的华账房是比较有独立性的。

汉口麦加利支行首任买办唐寿勋，是早年汉口有名的粤籍茶商，他当了二十多年的该行买办，死后仍由族弟唐朗山继任。唐朗山原即在汉开设惠昌花香栈和厚生祥茶庄，后又同友人合股开

设兴商茶砖加工厂，并购得麦加利股票三千英磅。不过依照该行董事会的规定：“凡是外国人（指非英国人）持有该行股票，只能以英国人的名义，在伦敦总行登记”，故其名为该行股票持有者，实际还是托汉行英籍经理出名登记的。他当买办的保证金，现款缴得不多，就以此项股票和价值十万元的不动产契约作为担保品。到第一次欧战期末，他派人往沪以高价购回德国颜料一批，至欧战停止，市价暴跌，亏银十万两，才把茶栈、庄、厂先后收歇了。他以买办的身份，当过汉口总商会二至八届的会董。他干到1929年去世时为止，剩下有洞庭街楼房三栋和黄兴路宝华里一个里份，尚可值银数万元。

汉口麦加利的现金收支，均须通过买办账房，对中国客户的放款、押款等，买办须负责担保到期收回。

买办账房的职工，依照契约归买办负责雇用。在唐朗山任买办时，账房雇有职员八至十人。其中出纳三人，一人经管元宝、现洋，二人经管银钞收支；跑街一人；买办的有力助手是“跑楼”，他的职务是与写字间联系工作，对核账目，管理银库内部钥匙，跑楼是奉买办之命去打开库门，必须先请西人司库，打开银库外门一同进去，其余是簿记员等。另有工友十人，为出店八人，看门二人。职员工资为每月四十至八十元，工人工资每月为十八至二十四元。一律供给伙食三餐，年终买办赚了多的钱，可以分点红利。写字间每月付给唐朗山的包银，开始是纹银八百两，后因业务发展，增到一千二百五十两，合银洋一千八百元。

继任买办的有唐铭琛、邓昊民。

抗战以前的业务经营

汉口麦加利支行的营业，开始范围不大，主要是买卖外汇和经营茶商的放款、汇款。至辛亥革命后，由于市场日趋繁华，洋行、工厂激增，运输交通活跃，便促进了该行业务的扩展，每年的

净利约有银洋二十万元左右。在第一次欧战期间，它为了鼓励英商和对德宣战的各国洋行大量在汉抢购战略物质，乃大做透支贷款和押汇，由于利息和外汇上获了厚利，故1914年至1917年，每年净利增至银洋三十万元。1929年以后，汉口市场受到世界经济恐慌的影响，它的业务才转向衰落，但外汇一项尚勉可保持，包括放、押款利息及汇款等手续费，每年净利还有十多万元。1935年实行法币时，麦加利亦曾参与其事，汉行并帮同把白银运到英国换取英镑，也获得了一笔厚利。1929年至1938年此十年间，每年经营情况，虽然有好有坏，平均与前相差无几。我是1921年进该行的，对于它的营业，就从这时谈起。

1921年，在汉外商都与麦加利有往来，主要是因为他持有较充裕的外汇，价格又较平允，平时的往来中，则又以德商洋行交易为多。它在1937年以前，外汇营业额每年都在七十万英镑以上，最高时曾超过九十万英镑。其经营外汇方法是：每日上午十时以前，由上海总行将当日的英镑、美元买卖价格，用电报或长途电话通知汉行，届时即有各国汇票掮客，来把行情抄下分送各有联系的洋行。麦加利对于往来大的洋行，则由经理用电话直接告知。买进或卖出一笔或数笔外汇，只要数字在五百英镑或一千美元以上，例即拍一加急电报通知上海总行，由它在沪买卖抵销。

自七七事变后，中央银行为了不使外汇落入日寇手中，采取控制措施，在上海的英、美银行需要外汇，则由中央银行供应。由于数目的限制，上海麦加利每次分派到的外汇，约为一万英镑，上海总行除自留一部份外，余则根据各地支行的需要进行分配。汉行每次分配到的外汇，开始是一千五百英镑，两月后即减至八百英镑，有时也只给五百英镑。那时在汉的进口商行还很多，常感不敷分配，以致引起争执。1937年12月南京沦陷，中央银行撤离上海，外汇业务即停止了。

麦加利经营外汇，一贯不作空头，每年从外汇业务中获得的

利润，亦全数归入上海账内。姑以汉行每年经营七十万英镑的外汇来说，其买卖差价一般为百分之一，则年可获利七千英镑，合法币十一万六千元。八十年来的麦加利汉行，仅在此一项业务上，就攫取了我国财富近一千万元。如果加上在华的其他七家分支机构和上海总行，仅在外汇一项上的盈利，为数当在一亿元以上。

汉行除经营外汇外，又经营兑换外国币券及旅行支票的业务。它收进的英镑、美元纸币或硬币，数在十英镑或五十美元，则径交英商保安水火险公司，寄往伦敦或纽约麦加利银行，收入上海总行账内。如此慎重其事，也会购入伪钞。1935年，英商安利英洋行送来美钞二百元，兑换寄去后，约月余忽接纽约分行拍来一电，指出其中有一元面额的美钞五十元是伪造的。此种伪钞的头像是林肯，而真钞则系华盛顿。后来据安利英的西人说，这笔美钞是日人托他代办的，当将兑去之款索回了事。

汉行业务中有：存款、放款、栈单押款、活存透支及汇款等项。存款分定期和活期两种，定期存户多是中国人，其次西人和印度人，存款总额共约三十万元，利息半年期三厘，一年期四厘；活期存款，有法币活存四百多户，英镑活存，约一百多户，共为五百多个户头，存户除洋行及少数中国商行外，私人则以英侨及外国传教士为多，但为数均不大，周息一律一厘。中国人开户，还须通过买办介绍，存款以三百元起码，还须留下印鉴。取款时填写支票，由买办在背面签字，送写字间记账后，再送回买办间取款，手续麻烦，取款一次要等候半小时至一小时，故开户者较少。放款一项，多为贴现及押汇，以钱庄为主要对象。贴现每笔二千至五千元，日息每千元四、五角，期限三、五天。押汇因有单据作抵，金额及期限均可放宽，买办除负责到期收回外，还可向行方取得一至二厘的佣金，每半年结算一次。栈单押款，以外国洋行、仓库或堆栈的栈单为标准，并须是认为易于出售的

货物，还要随时派人检查。火险由借款人处理，保单交行存执。如系中国客户，仍要买办作保证人。

1937年冬，汉口麦加利支行还干了一段时期的黄金押款。那时，香港有一家专营金银的道亨银号，同香港麦加利有往来。该号探悉汉口黄金价高，遂求港行介绍其股东粤人董干文往沪，由上海总行转介汉行买办邓昊民，帮同经营黄金生意。开始由道亨每隔一周或旬日（后又改为三、五天一次）由港空运黄金十多条（每条十两）来汉，由行代收，通过邓昊民转交董干文。董人地生疏，语言不通，就托邓昊民代办。每次黄金运来，都由邓昊民吩咐齐南陔，向江西帮邹协和、同丰等金号兜售的。由于当时黄金有涨无跌，金号买进并不及时卖出，即转向麦加利抵押借款，以谋暴利。董干文把卖掉黄金之款，即电汇上海换成外汇转香港。这笔黄金买卖，汉行除获得董干文的汇费外，并得到了金号押款的利益。而邓昊民所获利益则更大，既赚了董干文托卖黄金的价钱，又取得了托办手续费，同时又得到了行方给予的押款佣金。邓昊民为了笼络职工替他效命，曾允提红利一成，但他一向钱到手就不想拿出来，直到职工质问，才勉强分给十元至十五元，就算敷衍了事。但他对于洋经理杰米生则多方献媚，除赠送经理本人金表、金练外，另送其华籍情妇费某（交际花，邓昊民介绍的）金臂镯和钻戒各一支，又几次请他夫妇和会计员到冠生园大吃大喝，一掷千金，毫无吝色，约有半年之久，至中央银行金融管理处干涉才停止。

活存透支，全是洋行。它们总行同伦敦麦加利总行都订有透支契约，并规定了数目、息金和期限，而各客户也都是以物押汇，偿还透支贷款。因此，汉行既做了外汇买卖，又获得了贷放利息，而洋行则借助它的贷款，加强抢购市场物质。

国内汇款主要是申汇，以钱庄为对象，国外汇款除少数英镑、美元外，以印度卢比为较多（因许多洋行，多雇用印人守

门)。1937年冬南京沦陷，武汉的军阀、官僚、巨商大贾都将大笔现款汇往香港，大多是由麦加利汇出的。

麦加利上海总行原有钞票在汉行使，数字无法统计。汉口麦加利支行又在1932年自行发行钞票，总额三十万元，票面分五元、十元、五十元三种，全在英国印刷，由伦敦总行分两批运汉发行。它的钞票在市面流通，换回了元宝和银元。当1935年冬我国实行法币政策时，汉口库存的现银即有二十万元。1936年2月，它奉上海总行命，把这批白银全数运沪后，即登报以与法币兑汇率一比一，通告收回它在汉发行的钞票。截至1949年2月它歇业止，先后只收回了七万七千四百元，除发行了十八年的息金不算，又吞没了我国人民财富二十余万元。

沦陷时期日寇接管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在汉外国银行，还想苟延残喘，经其公会议决，将每日营业时间改为上午十时至下午一时，来应付活存提款和存款，有时也做些国内外汇款及对钱庄小额放款。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事爆发，至12月15日，汉口麦加利支行全部由日军金融班接管了。库存法币二十四万余元，并有客存的大小铁、木箱数十件。这些箱子在存入之前，由顾客锁好加封鉴，行里代为收存，并不开箱检视，只规定每大件收保管费十元，小件收五元，不计限期，各给收据一纸，上面写着：“收得某某已经锁好的铁（木）箱一只，内容不详。”后来日寇接管时，箱子均被打开，发现有：外国公司股票、汉口西商跑马场和英国波罗馆所发的债券，以及银奖杯、西餐用具、银筷、玩具等等，这都是西人存放多年的，另外还有金条、金块、元宝、银洋、金银首饰、珍珠项链、钻石戒指等等，这多是我国富商巨贾，在战火逼近武汉时，经买办介绍存进来的。日寇除将股票、债务及不能兑现的东西仍放回原处外，所有库存现金及客存金银宝物等均劫取一空。

后来正金银行，曾办理一次发还中国人、中立国人在汉口麦加利的私人存款，也只是根据存数大小，发还二至四成不等。

日寇除接管洞庭街五十五号麦加利大厦及职工宿舍外，还接管有球场街铁路边仓库两栋、职工住屋数间及晒牛皮用的空地一大块，此项地产是意商义华洋行于1921年因营业失败，偿还麦加利贷款银二十余万两的抵押品。

日寇将该行经理代维斯及会计员华琼斯送到青岛路欧美侨民集中营去了。翌年5月份在日、英互换敌侨时，他二人才回到了英国。日寇对于该行职工，除花匠李康珍和暖气房工人曾宪明被留下工作外，其余十五人连同买办邓昊民，一律给三个月工资遣散。

胜利后复业和最后结束

1945年8月日寇投降，在汉口代管英美权益的瑞士代表代理领事肖克，委托我和大写唐瑞卿，办理汉口麦加利财产接收，与日军金融班取得联系后，由其将大厦内还存有的财产开列清单，派代表一人同我们办理交接手续。当时发现，行里原有办公桌椅及西人住房内的柚木家俱和钢丝床等多已失散，而换来的都是些陈旧的东西；另有几部计算机、英文打字机和保险箱，也被正金银行取去了。再门锁、钢窗架、汽达、热水管及围墙铁栏杆等，也都被日寇拆运回国造枪炮去了。大厦在1944年美滥炸时亦有多处受到燃烧弹破坏。日寇交了就撤走了，我们一面找人看守，一面去信上海总行报告接收经过。到10月中旬总行才派行员摩佛来汉。摩佛向正金和日军金融班查询失物，几经交涉迄无结果。后来有些顾客来提箱子，经理白礼士强调说：“这是战事关系，本行不能负责，而箱内究装何物，收据也未写明，更是无从清查”，就这样推得一干二净。原处余下未劫走之物，至歇业时，即交与驻汉英领事代管了。

自1946年摩佛离汉后，上海总行派经理罗逊来汉，汉行至翌

年1月2日正式复业。开始曾做过一段时期的钱庄信用放款和棉花等栈单押款，并也做了少数外汇交易，就中只是和记蛋厂的数额稍多一点。后来纸币不断贬值，市场金融紊乱，又陷于停顿状态。

1948年冬，经理白礼士从英领馆和美国新闻处打听到淮海战役结束，解放军将移师南下，即向上海总行建议：趁武汉未解放以前结束汉行，以少数解雇费遣散员工。至1949年2月，上海总行就采纳停业的建议。汉行结束时，西人就只有白礼士一人，华人有职员七人，工人九人。大笔唐瑞卿退休，除买办邓昊民及看门二人被留下管理产业外，其余职员五人，按工龄长短，分别给了三月至十五月工资的解雇费，工人七人，则一律给工资三月遣散。

白礼士在结束的次日(2月16日)就连忙离汉转港回国去了。行前又将大厦二、三楼分别租与平和洋行和福中桐油公司英籍经理作住宅。直至1950年秋，该二人回国后，才由邓昊民把大厦全部租与人民政府机关使用。每月包括球场街产业的全部租金，除应交纳房地产税及支付邓昊民月薪四百四十元和看门二人各四十二元外，余款均按月汇上海总行。

解放后该上海总行申请将在华各地分支机构的资产和所有职工交与我政府接管。后来得到上海市人委外事处的介绍，即于1955年4月26日与大华企业公司签订了房地产转让契约。在汉口的房地产，是同年5月1日由武汉市房地产公司代表大华接收的。邓昊民借口有病，不愿参加工作，工人王甫臣、张贵卿分配在房地产公司工作。

我于1949年汉行结束时，由经理白礼士介绍到汉口汇丰银行写字间工作，于翌年1月上班，到了三月间，该行奉上海总行通知停业。在结束时，该行存款项下，有代收江汉关税计法币二十多万元，还存在账上没有划拨抵解。我被留下管理该行在汉的产业，直到1955年5月才移交与武汉市房地产公司，我即转入该公司工作。

武汉最早的外商工厂——俄商砖茶厂

郭其耀

继1861年英国侵略者进入汉口之后，俄国人也接踵而来。1863年，俄商李特维诺夫在英租界下首的江滩边（现黄陂路口）首先开设了顺丰砖茶厂，在围成方阵形的几栋两层楼房中，高高耸立着三座烟囱，楼房里有当年最新式的蒸汽机、锅炉和各种制茶机械设备，由七、八百工人日夜操作。1866年，托克马可夫与莫洛托可夫在这个厂的上首（现兰陵路口）开设了新太砖茶厂。1874年，莫尔恰诺夫与佩恰特洛夫在英租界内又开设了阜昌砖茶厂。三个俄商砖茶厂是武汉地区最早的近代工厂。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才继续有其他的外国资本家在武汉设厂。

在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签订以前，外国人在华开厂还没有法律或条约的明文规定，认为他们有自由开厂的特权，而清政府时而禁止外国人设厂，禁止机器进口，时而又默许外国人自行购地建造一个个工厂。在1895年以前各地设立的外资工厂，主要是以便利在中国掠夺原料为目的的加工工业和修船工业，是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进行掠夺性贸易的从属物。全国共有103个外资工厂，总投资为2,800万元，而武汉的几家俄商砖茶厂及其在福建、九江的几处分厂，合计投资为560万元，约占总投资的1/5强，可见当时武汉的俄国砖茶厂的规模之大。

我国唐宋时即有茶马交易，设官专管专赏，以张家口为蒙汉互市之所，当时以川陕茶为主要易马的货源。明代以后，两湖茶

逐步取代了川陕茶，《明史·食货志》载：“番人嗜乳酥，不得茶，则困以病”，“湖茶味苦，于酥酪为宜”。两湖茶适合于边销蒙古、新疆。为了便于长途运输，明代即有制作茶饼的方法。十九世纪中期，制作技术有所改进。进而由制茶饼改进为制茶砖，将茶叶筛拣干净后，经蒸汽加热，再用木制平压机手工压成茶砖。从事砖茶制作与运销的主要为小西帮商人，制作砖茶中心地则在湖北的羊楼洞。资本最大的有晋帮的三玉川和口盛川等茶庄，经营茶叶贸易有一百多年历史，至1933年倒闭。

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羊楼洞居民曾达二、三万人，茶庄近百家，供制茶的庄房宽大，每栋均可容数百人在室内操作。压制砖茶的模具上有一个“川”字标记。印有这种传统标记的羊楼洞青砖茶，称之为洞茶，驰名塞外。据容闳《西学东渐记》载：咸丰年间，羊楼洞砖茶年销量超过20万箱（每箱136斤），青茶2,000包（每包140斤）。清政府在羊楼洞设立专局抽收茶税，附近几个县还设有分卡。茶税有箱厘、业厘、行厘，一次征收，其中箱厘每百斤银1两2钱5分，运抵汉口时还要征收落地厘每百斤二、三百文。清政府每年在鄂南收茶税银达183,800两，钱114,900串（据《湖北通志·经政志八》）。

汉口是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四省茶叶集散地，砖茶由汉口溯汉水运抵樊城后，改由陆路，用骆驼西运新疆，进入中亚细亚，或北运张家口及外蒙边境的恰克图，卖给哈萨克、蒙古牧民和俄国人。根据《尼布楚条约》规定，恰克图是中俄贸易的主要通道。我国主要输出茶叶和绸缎，而进口俄国的皮毛及织品。据英人奎斯德特《1857—1860年俄国在远东的扩大》一书载：从1825至1854年，经由恰克图输入俄国的贸易增加了7倍。茶叶数量特别巨大，恰克图的关税收入为俄国常年关税收入总额的15—20%。因此，俄国政府十分重视茶的贸易，而茶又为俄国人所喜爱，俄京圣彼得堡的贵族，把沙漠队商所运的茶叶当作珍品。俄商贩因

运茶而发了财。俄国人对进入我国内地直接收购茶叶真是梦寐以求。一当汉口辟为对外开放的商埠后，在恰克图经营茶叶的俄商便立即来到汉口。

俄商来汉，先是在产地羊楼洞一带招人包办、监制砖茶，为了与英商及华商竞争，他们出价暴高，收去较好的茶叶，监制的砖茶也比中国茶商的质量优良。后来，他们便在汉口开设工厂，雇工制造，将手工压制改为使用蒸汽动力压制砖茶。为了装卸运输进出茶厂的大量茶叶与砖茶，1871年顺丰厂首先在第七码头地方开辟了顺丰茶栈码头，是武汉第一个工厂专用码头。

三个俄国砖茶厂均采用新式蒸汽动力机与水压机压制砖茶，并自备电灯照明日夜开工。他们将收购的老茶与茶末碾细和匀，投入蒸锅软化后再装入压茶机内压制成砖，重量不差又无瑕疵的砖经蒸汽焙去水份再存放一周晾干后，用纸细心包装在竹筐里，每筐可容砖64块。产品分青砖茶、红砖茶与茶饼。最大的阜昌茶厂，雇工达两千多人，制茶工每日工资1.1元，杂工0.5元。

蒸汽压制砖茶，较之旧式手工压制提高工效25%，而废品率由原25%降为5%，每筐砖茶节省费用达银1两，且机砖茶比较坚固结实，外观比手工砖茶好，长途运输中破损率也较低，因之在市场上销售快，售价高。

七十年代汉口有俄商四大砖茶厂，共有蒸汽动力砖茶机15架、茶饼压机7架，砖茶机每台日产砖茶120筐（每筐130余斤），茶饼机每台日产茶饼21筐。数千名中国工人为俄国资本家提供高额利润，每年由汉口输出的砖茶约占全国砖茶输出总量的60%上下。九十年代与二十世纪初的20年中，每年由汉口出口的茶叶均在40万担上下，价值800万英两左右。

在俄国砖茶厂建厂的同时，外国轮船已开始直达汉口。俄商改变了传统陆路运输路线，先用轮船将砖茶由汉口运至天津，再由天津驼运到恰克图转运西伯利亚，这便比陆路运输大大降低了

运费，缩短了时间。后来俄国人更派出志愿远航队，自春至夏由汉口直接将砖茶运往敖德萨或运海参崴转运欧俄。

1862年，沙俄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俄陆路通商章程》。俄商运货出口，所纳关税按5%的税率三分减一，由天津出口的货物，除纳关税外，免征子口税，由其他口岸运货至天津出口的缴纳关税一半的子口税，在天津与关税一同征收，至1866年8月以后，连关税一半的子口税也干脆取消了。俄商运茶，每担只纳6钱银子的税，较之中国茶商的重重厘金税收负担，俄国人享受了超级的关税特权。

资本雄厚的俄国茶商，在汉口开设砖茶厂，运销砖茶，具有先进的机器设备，劳动生产率高，成本低，拥有优势的运输船队及销售渠道，运费少，周期短，更享有低税率的关税特权。在砖茶的制造与贸易中，这些优越的条件，远非中国茶商所能及。处于极不利地位的中国茶商，边销市场日益缩小，销路日减，茶庄年有倒闭。茶叶被俄商以各种借口压价收购，俄国人垄断了武汉和整个中国的茶叶贸易，其讹诈勒索层出不穷，仅回扎（扣秤耗和改换包装费）就高达20—40%，迫使茶庄、茶贩、茶农破产，羊楼洞可作茶庄的房屋数十栋都空闲下来。

1891年5月1日，新太砖茶厂为庆祝建厂25周年，举办了盛大宴会与展览。正在中国游历的俄国皇太子专程来汉口参加庆祝，参观了汉口的俄国砖茶厂。展品中有各色丝绸、汉口特产的丝绒、牛皮箱、鸟类标本、象牙雕等，还陈列了砖茶制造的全部工序，有最早的手工压机模型和最新的蒸汽机模型，后者是由上海祥生船厂代造的。这些展品全部当作礼品送给了俄皇太子。

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至二十世纪初，俄国资本独占汉口及中国的茶叶贸易，直到俄国十月革命，因政治变革，输俄茶叶贸易衰落。俄商砖茶厂中的顺丰、阜昌1916年停闭。新太为英商接办，易名太平洋砖茶厂。俄商独占茶市的局面乃告结束。